

星屋 杂忆

金性尧 著
金文男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屋杂忆/金性尧著;金文男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26-2622-9

I. 星… II. ①金…②金… III. 金性尧(1916~2007)—回忆录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9862号

责任编辑

王国勇

整体设计

姜明 明婕

星屋杂忆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社址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网址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8

插页 1

字数 310 000

版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6-2622-9/K·601

定价 32.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联系电话:021—36161455

目录

我的父亲(代前言) 金文男…1

此时有子不如无…40

一个声音消失了…42

获虎记…43

她才二十八岁…49

找寻…54

曲巷送别…56

忆若英…60

忆望道先生…70

鲁迅丧仪之忆…77

叶落归根…78

吉祥寺…84

白头青鬓隔存没…86

故人坟树立秋风…91

词流百辈消沉尽…96

说着同光已惘然…101

忆苏青…105

忆孔另境兄…108

忆陈子展先生…110

人世几回伤往事…112

旧事方城六十年…115

地留一土…117

悼黎庵…119

关于鲁迅的四封信…124
知堂的两本书…128
尘无的《浮世杂拾》…132
傅东华的《山胡桃集》…134
赵景深与中国小说史…137
读陆侃如致刘大杰书…141

忆《星屋小文》…146
《鲁迅风》掇忆…147
借古话今…155
《文史》琐忆…164

忆三家村…170
我与书…176
絮叨…196
斗室微吟…200
堕甑录…210
新文艺书话…215
似曾相识燕归来…226
逛商务…231

《唐诗一百首》的沧桑…234

关于《中华活叶文选》…240

古籍工作的忌讳…242

两本三百首…244

选本的时间性…250

夜半钟声到客船…252

民国诗选…256

旧诗选录…259

灯市…264

食味小记…272

江村之夏…277

故乡的戏文…286

苏州河畔…294

老房子…296

春雨楼头…297

滥竽录…299

三步曲…303

人豕之缘…305

虎年谈龙…307

本命年…309

星屋小记…311

我的父亲

(代前言)



我的父亲金性尧，笔名文载道，别号星屋，1916年5月5日出生于浙江定海的一个殷实之家，2007年7月15日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享年91岁。

父亲一辈子读书、爱书、编书、写书，是个纯粹的读书人。他才气横溢，博古通今，且经常将其化为平和通达的文字，与读者交流；同时，他性格率直，不谙世俗，并始终保持着传统文人的本色，为后人推崇。尤其到了晚年，他更是生活简朴，淡泊名利，只以文章为知己，视写作为生命，笔耕不辍，直到88岁出完最后一本文史随笔《闭关录》后，才无奈封笔。

回忆父亲的一生，童年生活富裕，青年主笔文坛，中年历经坎坷，晚年健笔纵横，走的是一条由作家到编辑、又由编辑到学者兼作家的道路。他青年时代追求进步，曾主编《鲁迅风》、《萧萧》、《文史》等杂志，为祖国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而晚年潜心撰述的著作，无论是对唐、宋、明诗的精辟评注，还是谈古论今的文史随笔，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父亲离开我们至今已一周年有余，他遗留下来的大量著作及文字，依然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尤其是他的一些怀人忆旧之什，更是在一些喜爱它的读者之间不胫而走。父亲生前就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曾叹其为“天下之至文”：“没有怒吼，没有痛骂，没有惊世骇俗的论议；然而看似平淡的字里行间，却汨汨潜涌着一种蚀骨侵魄、深深长长的哀思。”去年我在参与编辑《文以载道——金性尧先生纪念集》时，曾想将父亲的一部分怀人忆旧之什编入，但因篇幅太多，只得作罢。

现为报答广大读者的深厚情意，特从父亲发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杂志以及八十年代以后的随笔集中，精选一部分怀人忆旧之作，并配以有关照片编集成册，以父亲的

笔名“星屋”冠之，呈献给广大读者朋友。“星屋”本为父亲书斋名，后也作别号和笔名使用；“星屋”当取自黄仲则的名句“一星如月看多时”，父亲第一本由巴金亲任编辑的散文集即名为《星屋小文》。

本书所选文章大体按内容题材分为追忆家人朋友、作家作品、书籍报刊、家乡风俗以及童年、中年和晚年生活等几大类编排。下面我对父亲一生作一简单介绍，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父亲文章。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家世

曾祖父金祥绶是养子，二十世纪十年代时，他先是在上海推销颜料，后来和人合开了一家名为“公和来”的颜料店，同时销售德国进口颜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颜料短缺，奇货可居而致富。富裕后的曾祖父先是在老家购地百余亩，又在老屋地基定海北大街桑园弄口造起了一座精美的金家大屋，由此名声大振，被列为民国时期定海工商户“八大家”之一。

金家大屋建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一座前后三进三道，朱漆卷棚廊子，雕梁镂窗，呈“回”字形的两层砖木结构大楼房。第一进屋为五开间正楼三厢房的走马楼，楼内屋屋相连，廊廊相通。房屋建筑用九桁穿斗结构，重檐硬山顶，甚为气派。据老定海说，此屋的走马楼为定海建筑之首。可惜如此漂亮且具有建筑及文物保护价值的走马楼已于1998年初在定海旧城改造中被拆除，剩下的第二、三进房屋，2002年5月20日被列为舟山市“市级文物保护点”，却已破旧不堪，满目苍凉，令父亲痛心不已。

祖父金炳生也是养子，他继承了曾祖父的“公和来”颜料店股份。1915年左右，金炳生娶定海老家近邻甘茂庭中医的三女儿甘葆壬为妻。生育二子一女，长子性尧、次子性舜、女儿维新。儿子名中的“性”字当是辈分用字，“尧”和“舜”则反映了祖父望子成龙的殷切之情。

1933年，祖父为继承曾祖父的事业，率全家迁居上海，先是租房子居住。1936年左右，祖父母在今北京西路（时名爱文义路）1110弄开始建造14幢石库门房子，并以祖母名称

子女重访祖居(2007年8月)



之为“葆壬里”。1939年初，全家搬进了弄底的17号那一幢房屋，便是我们姐弟五人出生与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在此读书写作耕耘了一辈子的住所。“孤岛”时期，《文汇报·世纪风》编辑柯灵曾邀集在沪作家举行“星期聚餐会”，父亲在家中设宴招待过这些作家。其余的13幢房子则用于出租，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由国家房地产部门统一出租管理。

祖父一生节俭，仅靠曾祖父遗留的“公和来”股份的红利和“葆壬里”的房租收入为生。祖父反对作为长子的父亲读大学，更不赞成出洋留学，只希望父亲早日到洋行做事。哪知父亲畏商如畏虎，一心只想读书作文，到上海后，即使遵父命去了洋行做事，也仅勉强做了几天便不告而别。几个回合斗争下来，祖父只得作罢。祖父也喜爱文学，在定海金家大屋中藏有许多书，诸如扫叶山房石印本的四史、《文选》之类，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幼年的父亲。祖父于1958年因心脏病死于北京西路家中，年仅62岁。

祖母甘葆壬美丽端庄，精明能干。她略有文化，懂得勤俭治家之道，贤淑能干，为人善良。刚嫁到金家的时候，金家还只是一般的小康之家，全家迁来上海后，在她的精心治理之下，金家渐渐走向富裕直至大富。但她不忘老家亲友，经常慷慨接济乡下一些贫穷亲戚，帮助他们读书就业，看病成家等。

父亲与祖母的感情尤其深切，也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扫地出门后，他们曾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蜗居在8平方米的斗室中相依为命、相互体恤的缘故。祖母90虚岁那年因股骨胫骨折后感染病逝，父亲悲痛欲绝，曾作有《忆母》一诗：

平生所负非惟母，白发青衫为我裁。

盼到西山温饱日，劫灰销尽骨灰催。

还作有悼念文章《此时有子不如无》，皆令人读后伤感不已。

私塾生活

父亲小名大毛，是家里的长子，祖父母当然视为珍宝。六七岁时，父亲被送到距家一步之遥的阮氏私塾上学。

上学第一天，父亲来到塾中。只见书桌上香烟缭绕，气氛十分庄严肃穆，俨然有至圣先师高高在上的感觉。父亲先向书桌三叩首，又向老师行礼，最后与各位同学作了长揖。

老师开始上课了，先在课本上用朱笔写一个“富”字，再写一个“贵”字——私塾教育乃以富贵启蒙幼儿。课本是商务版的“人手足刀尺”的小学教科书，之后就读《百家姓》和《三字经》，再后便开始读《论语》。

几年之后，父亲开始读《幼学琼林》，由于课文朗读起来音节和谐，也易背易记，便渐渐对读书有了些兴趣，之后又读《古文观止》。后来进一步学作文了，题目不外“立身之道”、“学贵于勤”之类，基本都是议论说理却没有抒情写景，也没有表达自己思想以锻炼形象思维能力的机会（详见本书《早年的书签》一文）。

私塾的规矩是很严厉的，学生若不用心听讲或该背的书没背出来，老师要打手心或栗凿、罚跪；当然也有欢快的时候，那就是户外活动——可到课堂后面的菜圃和草地上“雀跃三百”：穿过竹篱，就是一望无际的水田和云天，可以抓蝌蚪、捉蟋蟀、放野火、跳高栏，尽情享受大自然中的自由和欢乐（详见本书《忆三家村》一文）。

十二三岁时，父亲换到王家祠堂私塾，读了二至三年的英语和数学，觉得很有趣味，

于定海金家大屋中(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前排右一为父亲)



加之相处的同学也都颇具个性，都很勇敢豪迈。有一段时期，他们沉醉于武侠小说中。有一次，居然还想摹仿书中侠士的行为，要替地方除暴安良，但最后不知怎么也就洗手星散，依旧读他们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去了（详见本书《我与书》一文）。

综观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阮氏私塾所接受的教育虽基本上是枯燥却是扎实的；在王家祠堂私塾所受的教育则有所“维新”，知识面开阔了，课余生活也较丰富且欢快；迁居上海以后在1936年时，父亲又曾师从忻江明（清光绪三十年进士）先生，进一步读了四书五经等圣贤经传（详见本书《絮叨》一文）。

十余年的私塾教育给父亲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使他日后的“散文牢固扎根于传统之中”（美国学者耿德华语），父亲晚年在所撰《散文的境界》中也提到：“散文作家还得和旧学结点缘，使人感到空灵中自有一种酽然之味，而不流于空疏。”当然，父亲也深刻认识到私塾教育的流弊，他在青年时所撰的《忆三家村》中就提到：“我想，以十余年授受之谊说来，我是应该感谢几位老师们的。然而，以我所受于他们的痛苦和流弊而论，恕我直率的说，却是从心底送出我的憎恶。”这便是私塾教育在父亲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两重性。

婚姻

母亲武桂芳比父亲大一岁，祖籍也是浙江定海。舟山人的风俗是喜欢讨“大娘子”的。

1932年初，为躲避“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对上海的进攻，17岁的母亲随外婆来到定海武芸芝堂姐家。当时金家大屋的大门正对着武芸芝家的后门，而武芸芝的丈夫又是祖母的哥哥。一点点沾亲带故，又都喜爱读书写作，使父亲和母亲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不久便订下了婚事，并于1935年结婚，父亲时年20虚岁，母亲21虚岁。

母亲出生在上海，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高中时的国文课老师，就是著名作家、记者曹聚仁。母亲喜爱写作，文笔非常漂亮，高中时期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上海市高中毕业会考时得过第一名，照片还上过当时的报纸。在她去世时，哀悼者送的挽联中就有“春风得意第一”之句。

母亲的文章不仅文笔清新流丽，意境也很悠远独特。巴人在1939年世界书局出版的，



父亲和母亲(1935年)

由母亲、柯灵、关露等八人的合著《松涛集》编后记中写道：“桂芳寄情于事，疑似于散文小说之间，别有悠远境界。”2004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中国现代文学试题卷中有道作文分析题，选的范文就是母亲的散文《怀远天的老人》，是母亲当年追忆外公之作，写得非常感人。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因为大家庭经济条件很好，他们不用担心生计，整天在家读书写作，出门逛街也是去书店购书或者购买文物字画等，偶尔也携手一起拜访朋友，并经常参加一些文坛的活动。

三十年代中期，也即母亲结婚前后，她的文学创作进入了黄金时期，曾以“木圭”为笔名（即将“桂”字一拆为二），先后在《鲁迅风》、《离骚》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出版了与他人的合著《松涛集》和个人作品集《背上了十字架》，并将签名本《背上了十字架》一书赠送给许广平先生。

母亲与许广平的交往是颇为密切的。先是去许广平家参加中共地下刊物《上海妇女》杂志的校对，不久又由许广平介绍参加《上海妇女》编辑委员会，还经常跟随许广平外出采访、报道“孤岛”时期上海难民营及纱厂女工的生活，她的小说《新生》即以纱厂女工的生活为素材，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母亲还参加过文艺通讯写作班，是“孤岛”时期上海颇为活跃的女作家之一。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宪兵将许广平抓去，并在许广平家中搜查出母亲赠送给



教师时代的母亲(五十年代)



“文革”刚结束时的母亲(1976年)

她的《背上了十字架》一书，因上有签名“木圭”两字，日本宪兵把母亲抓去，说她是“延安责任者”，用灌冷水和抽皮棍强迫她招供，但她什么也没说。最后还是父亲通过中共特工人员鲁风，将母亲保释了出来。

结婚初四年，母亲还没生育，她性格活跃，经常参加进步活动，于1940年左右想去延安参加革命，父亲虽然心里不乐意也不反对。但在出发的前一天，她被祖母发现并关了起来，这样才没去成。

母亲于1939年生育大姐大男，之后又接二连三生育了三女一男，相夫教子的辛劳使母亲基本放弃了写作，解放后成了长江中学（后为青锋中学）的语文老师。

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在家的日子，就是在书房中，在写字桌前度过的。而对于我们姐弟五人的教育和培养，则基本都是由母亲承担的。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大姐冤死。在最黑暗最艰难的日子里，母亲在做好教师本职工作

之外，以她柔弱的肩膀独自一人承担了全家精神和经济上的千斤重担。

“文化大革命”结束，大地回春，但母亲终已积劳成疾，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几次小中风，最后在1990年6月8日，永远地离开了深深眷恋着她的亲人——父亲和我们姐弟四人。父亲在悼念母亲的短文《一个声音消失了》中，曾引用黄仲则《金陵待稚存不至适容甫招饮》“偶然持论有崎岖，事后回首皆相思”诗句，并说：“夫妻之间的争吵摩擦更是难免，一

旦存殁相隔，连从前的星米之争，也成为永难重现的怅惘。又因自己也已西崦暮齿，说是长别，其实也是小别。”父亲的这段话，是只有经历了婚姻的生离死别的一方才能感受到的，具有很深的哲理。

经过17年的“长别”，如今父亲终于和母亲能在九泉之下重逢了。愿他们仍与在这个世界一样，读书写作、诗文唱和，并同样地星米相争、琴瑟相和。

和鲁迅的四通书信

1934年，父亲18岁，是个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他当时在中华煤球公司工作，业余为家乡浙江定海的《舟报·欸乃》副刊写稿，写的主要是杂文，同时在上海和乐时鸣、胡世奎、周中奎等舟山籍青年创办微明文学社，并出版过《微明》月刊。

当时他非常敬仰鲁迅的风骨，极想一睹鲁迅的风采，也想向鲁迅请教如何更好地写作杂文，鼓足勇气之后，便写了一封求见信给鲁迅，并托内山书店转交。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详见本书《关于鲁迅的四封信》一文）。

父亲和鲁迅的书信来往虽然最后因父亲的年少气盛，言辞之间也不够尊重，鲁迅先生在回复了第四封信后便中断了，但却丝毫未影响父亲对鲁迅的敬重和崇仰。

两年后，鲁迅去世，父亲和母亲一起去万国殡仪馆参加他的葬礼（详见本书《鲁迅葬礼之忆》一文）。

1938年4月到5月间，父亲到淮海路许广平家中帮助她校勘《鲁迅全集》，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曾提到此事。同年6月15日，《鲁迅全集》出版，父亲非常高兴，他在那年11月出版的《边鼓集·说到鲁迅全集》一文中道：

在这“言路之窄，正如活路之窄”的上海，居然能有这样浩大的人力，物力，出版了厚厚二十大本的《鲁迅全集》，恰如出现了一颗子夜的巨星，那光芒，那重量，那望不见的美，听不到的声，将永远炫耀在人们的头上。然而，也因此而唤起了我们的回忆，悲凉了我们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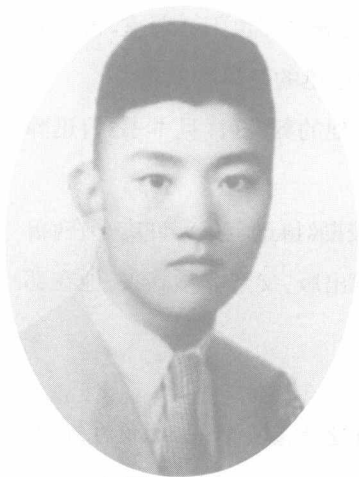
鲁迅去世后，父亲一直很珍惜和鲁迅四通书信的这段情谊，很长时间内也一直珍藏着这四封信。1957年时，父亲得知沈鹏年先生正收集研究鲁迅的资料，便将四封原信赠送给沈先生。沈先生特地函告了许广平，许广平将它们编入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7月编的《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中。1964年时，沈鹏年将此四封信交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后编入《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珍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1982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与父亲正式办理了捐赠手续。

编辑《鲁迅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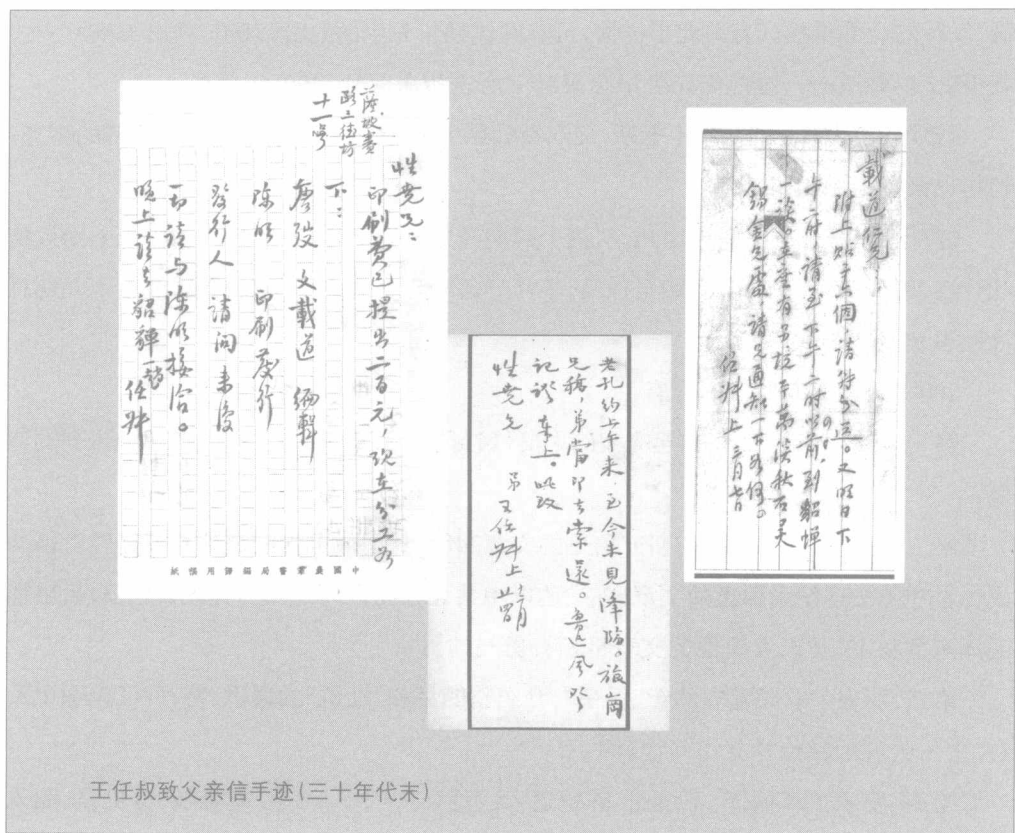
1938年下半年，上海文坛上展开了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战，一些作家对“鲁迅风”杂文提出种种责难。父亲是当时上海文坛的“鲁迅风”杂文作家之一，针对这种情况，他

提出索性办一个专门发表“鲁迅风”杂文的刊物，刊名就叫《鲁迅风》。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委员王任叔的支持和部署下，《鲁迅风》杂志创刊号于1939年1月11日出版。

《鲁迅风》是同性质的周刊，由父亲与许广平、柯灵、王任叔、孔另境、周黎庵、唐弢等共同集资创办。发刊词由父亲撰写初稿，经王任叔修改后以“巴人”的笔名登出，除了引用毛泽东评价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是“新中国的圣人”外，还认为“我们为文艺学徒，总觉得鲁迅先生是文坛的宗匠，处处值得我们取法”。柯灵认为，发刊词的最后一段话阐释了办刊宗旨：“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采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



三十年代的父亲



王任叔致父亲信手迹(三十年代末)

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

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办这样一本杂志是很不容易的。王任叔请当时在上海办小报的冯梦云、来小雍出面，到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注册登记，才拿到《鲁迅风》的登记证。名义上冯梦云是编辑，来小雍是发行人，但实际主编是父亲。除了王任叔、柯灵参与组一部分稿之外，杂志的其他一切事务，几乎都由父亲一人承担。为了节省成本，努力维持杂志生存，《鲁迅风》不发稿费，办刊人不领报酬，办刊地点就设在父亲家里（详见本书《〈鲁迅风〉掇忆》一文）。

《鲁迅风》创办时，王任叔起初指定由另一位著名作家和父亲共同负责编辑，可那位作家因故未能膺命。父亲只得勉为其难，几乎独自一人挑起了组稿、改稿、校对、广告、印

刷、发行的全部重担。(有关此事详情,可参阅沈鹏年先生的《文以载道 秀出天南》一文,载于《文以载道——金性尧先生纪念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鲁迅风》从第一期至第十七期,父亲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承担了几全部的事务,刊物也渐渐地办出了特色。

《鲁迅风》一至十三期为周刊,从第十四期开始改为半月刊,在版式和目录上则效仿《语丝》。周刊每期有长短文章9至12篇,半月刊每期有长短文章16至22篇,前后十九期总计发表长短文章约260多篇。

260多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有:

第一,连续六期发表了鲁迅先生的书简(14封信)、日记和手迹,以及瞿秋白未刊的诗稿;

第二,发表了纪念、评介、研究鲁迅的文章24篇,其中最可贵的是从延安辗转寄来的成仿吾和陈伯达纪念鲁迅的文章(陈伯达以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身分去延安,后出任毛泽东的秘书,父亲发表他的文章是颇有勇气的);

第三,发表了歌颂延安的《红堡垒》,介绍新四军和“江抗”的通讯、特写《江南通讯》、《二十一天》以及《徐特立访问记》等;

第四,发表了郑振铎、王统照、陈望道、沈尹默、许广平、巴金、魏金枝、李健吾、赵景深、萧军、萧红、骆宾基等“五四”时期至“左联”时期的新老作家的作品约40篇;

第五,发表了从内地传来的茅盾、郁达夫、叶圣陶、丰子恺、胡风、黎烈文、曹靖华、萧乾、何家槐、周钢鸣、顾颉刚等《乱离中的作家书简》15篇(其中白危的信介绍了延安鲁迅学院的情况);

第六,发表了巴人、柯灵、孔另境、文载道、唐弢、周木斋、周黎庵等“《鲁迅风》同人”的文章52篇;

第七,发表了宗珏的《文学的战术论》、《抗战中的新文学主潮》,蒋天佐的《为了真理》,锡金关于新诗等长篇论文共约10篇;

第八,连载发表了邵荃麟译高尔基的小说,黄峰译高尔基、辛克莱的《日记》,胡仲持译《文人岛游记》等外国文学作品。